

## 清代扬州学派语言学研究述略

徐 秀兵

### I 选题缘起

扬州历史悠久,《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等九州传说,扬州即为其一。自唐以来,扬州时常被认为是歌舞升平、远离主流文化之地,屡为诗人所吟咏,如“十年一觉扬州梦”(唐·杜牧《遣怀》),“人生只合扬州死”(唐·张祜《纵游淮南》)等等。其实,“清乾隆以后,最重要的文化全在扬州,像王念孙、汪中、焦循、江藩等人就云集于此”。(启功2010: 153)而王、汪、焦、江等人正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清代扬州学派是一个地域性的学术共同体,因其成员均系扬州府籍或流寓扬州而得名。

清代扬州学派的形成与扬州的地理位置、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相关。扬州是地处长江下游的水运交通枢纽、京杭运河中段的要津和清政府的盐务重心,但它不是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的驻地,较诸南京、苏州受政府和地区军事化的政治控制相对较弱。乾嘉之际,扬州成为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成为南来北往的商人、士人和官员等的必驻都会。经济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繁荣,一时著名学者如戴震、惠栋等都云集于此著述讲学。扬州历任地方官与臬政、转运使及一些大盐商,大都礼贤下士,重视府学和书院教育。例如,扬州学派的汪中以盐政戴全德荐,往杭州校勘文澜阁《四库全书》;扬州学派的任大椿、李惇、王念孙、汪中、刘台拱等均肄业于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等当时影响最大的书院。

自清末以来,学者逐渐注意到地域与学术之关系,分地域、分领域成为研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指出,学问“当分业发展,分地发展。……所谓分地发展者,吾以为我国幅员广垺全欧,气候兼三带,各省或在平原,或在海滨,或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

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科学，某省人最宜于文学美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量之发展”。刘师培《清儒得失论》说：“古帝宅居，悉在黄河南北，厥后战胜苗族，开启南方。秦汉以还，闽越之疆始为汉土。故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详考中国南北方在诸多学术领域的风格流变，指出“南学”以吴越和浙闽为中心，“北学”以徽州和扬州为中心，南北学派各有特点并相互影响。刘氏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扬州学术群体在清代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及惠、洪、顾、赵友教扬州，而南学渐输于江北。……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

现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学科细化、专门化，而扬州学派治学范围广博，涵盖天文、历算、经学、小学、诸子、历史、地理、文学等诸多领域，可能无法简单纳入现代某一学科体系之中。本文以语言学为视角，参考前贤有关扬州学派的研究成果，钩稽扬州学派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总体风貌，以窥扬州学派宏大学术殿堂之一斑。

## II 清代“扬州学派”界说

乾嘉汉学，又称“乾嘉朴学”，专指考证、训诂之学，其特征是崇尚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乾嘉汉学肇始于清初顾炎武，顾氏在《日知录》中痛斥明代文人因空谈理学心性而误国，“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主张欲求正确理解儒家经典必须以究明字义训诂为基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嘉庆十六年（1811）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著成，宣告“汉学”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该书总结清代汉学的发端、奠基、鼎盛三个阶段，梳理了推动学术发展的师承传授关系。江藩在前言中讲：“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该书为后学评述清代汉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章炳麟《庵书·清儒》说清代“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

论》说清代学术“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集中介绍了清代汉学之发端人物黄宗羲和顾炎武，卷一介绍汉学之奠基人物康熙年间的阎若璩、胡渭。卷二至卷六，是全书的主体，吴、皖两派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构成其主干。卷七为陈厚耀、程晋芳、贾田祖、李惇、江德量、汪中、顾九苞、刘台拱、徐复、汪光燾、李钟泗、凌廷堪等扬州地区学者，因王念孙等学者当时尚健在，故未列入。江藩将扬州地区的学者在清代学术史上集中亮相，也意味着“扬州学派”一词已经呼之欲出！其后，“扬州学派”逐步为学界所认可，其界定亦逐渐明晰。

清中后期的学者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最早提到“扬州学派”名号，他说：“扬州汪氏（即汪中）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清代乾嘉学派除了吴、皖两派，“尚有扬州一派”。民国初年尹炎武所撰《刘师培外传》亦较早提出“扬州学派”并有简单论述。此后还有支伟成、柴德赓等学者也不同程度的关注过扬州学派。第一个对扬州学派进行系统评述的要算当代学者张舜徽先生。1946年，张氏在兰州大学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重点放在扬州学派。1962年，张氏出版了《清代扬州学记》<sup>(1)</sup>。1980年，张氏在扬州师范学院作了“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路”的演讲。1991年，张氏又在新出版的《清儒学记》中，专立“扬州学记”一章，指出吴、皖、扬三派各自的学术特征，即“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卞孝萱2005）

清代扬州府，下辖泰州、高邮二州和宝应、兴化、江都、仪征、甘泉、东台六县，人文学术发达（如出现了著名画家“扬州八怪”等），对清代及后世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名词，扬州学派并不是贯穿于扬州地区从古至今的一个学派，也不能把从清初到清末，凡属扬州籍的学者，都笼统地划入扬州学派。扬州学派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一个分支。顾炎武乃乾嘉学派的“不祧之祖”，阎若璩、胡渭等是其“直接先驱”，但在顾、阎、胡等人时期，乾嘉汉学尚并未形成独立学派，直到乾隆时期的惠栋公开打出汉学旗帜后，乾嘉汉学才正式成为独立的学派，接着在乾嘉汉学中

(1) 本文征引的有关扬州学派成员的论述，均见于张舜徽先生《清代扬州学记》等著作，为减少行文枝蔓，恕不另行标注详细出处及页码。

又分化出吴派和皖派，形成汉学的鼎盛局面。扬州学派活跃于乾嘉道时期，其直接的学术渊源是乾嘉汉学中的吴、皖两派，是在乾嘉汉学发展至鼎盛并逐渐走向衰落之际产生的一个学派。

### III 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语言学研究实绩

扬州学派是在不断发展壮大并自我体认中逐渐从吴、皖两派中独立出来的。汪中《述学外篇·大清故知县候选李君（惇）之铭》：“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有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席，不相依附。”可见，在惠栋和戴震各创学派，为学者所宗之后，汪中、李惇、王念孙、刘台拱等亦“各成其学”，成为扬州学派的开创人物。尹炎武《刘师培外传》明确肯定了扬州学派的存在，而且勾勒出该学派的发展线索、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成就，“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袭三世经传之业，门风之盛，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隆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

乾嘉学派的“小学”成就举世公认，“小学”最初附庸于经学，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前身，包括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等分支。扬州学派是从乾嘉学派中发展独立出来的，在“小学”研究领域可谓硕果累累，下面简述扬州学派代表人物在传统“小学”即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脉络和主要成绩。为叙述方便，请先看表1《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语言学相关论著示例》：

表1 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语言学相关论著示例

人物	生卒年	地区	语言学相关论著举例
王懋竑	1668-1741	宝应	《朱子年谱》
刘台拱	1751-1805	宝应	《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 《淮南子补校》《方言补校》《汉学拾遗》《文集》
刘宝楠	1791-1855	宝应	《论语正义》
王念孙	1744-1832	高邮	《广雅疏证》《读书杂志》
王引之	1766-1834	高邮	《经义述闻》《经传释词》

人物	生卒年	地区	语言学相关论著举例
任大椿	1738-1789	兴化	《弁服释例》《深衣释例》《小学钩沉》
汪中	1744-1794	江都	《述学》《小学》《说文求端》
江藩	1761-1831	甘泉	《国朝汉学师承记》
焦循	1763-1820	江都	《易章句》《易通释》《孟子正义》《雕菰楼集》
黄承吉	1771-1842	江都	《字诂义府合按》
阮元	1764-1849	仪征	《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山左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刘文淇	1789-1854	仪征	《左传旧注疏证》《左传旧疏考正》
刘师培	1884-1919	仪征	《刘申叔遗书》

## 1 王懋竑及其同乡后学

王懋竑虽然专攻宋明理学，却从朱子遗书中整理出许多实用的语言学知识，开朴学风气之先。他研究朱子之学，是运用考证的方法，和一般浅尝浮慕的人不同。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钦佩其谨严方正之学风，为其《朱子年谱》作序时说：“自处闺门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处大节，举无愧于典型。”其同乡后学刘台拱、朱彬、刘宝树、刘宝楠、刘恭冕、成蓉镜、刘嶽云等，均受其影响。尤其是刘台拱，“在乾嘉学者中，允推第一流”。刘台拱的学术又影响到他的表弟朱彬和侄儿刘宝楠。刘宝楠《念楼集》卷六《问经图序》：“窃谓今之言经学者，以许、郑为宗。许氏明于六书，郑氏精通《三礼》。然郑氏注经，于《毛诗》《礼记》则云：某字作某，某读曰某，于《周礼》载故书；于《仪礼》载今古文，故而郑氏精于小学。魏晋以来，乞于宋明，张揖、陆德明、李善、徐氏兄弟外，少有精研小学者。故郑学既微，而许氏之学几绝。国朝经学昌明，过于汉唐。由训诂声音以求义理，复由仓颉作书之指以求其本义及其通假，而经学益大明。虽佶屈不可读之书，无不晓畅明白。欲治圣经，先通小学。世上有薄小学为不足道者，非真能治经者也。”刘宝楠明确说明了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是小学的三个重要分支，由此可以通经，可以明白义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 2 王念孙父子及其学侣任大椿

王念孙从小随父亲王安国居京师，其父礼延当时流寓北京的知名学者戴震到家里，专为念孙讲授经义。因此，念孙做学问的基础，在幼年时便已奠

定。念孙儿子王引之，一生治学，以父为师。从事声音、训诂、文字之学，父子讨论，互相证发。引之在少年时，已经和他的父亲同时为学术界所推重了，“高邮王氏父子”这一名词也在学术界肯定下来。

王氏父子之学的总精神在于“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王念孙父子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训诂学和校勘学两方面。王氏父子著述丰赡，但最重要的是父子二人共同创作的“王氏四种”，即《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

王念孙毕十年之役方完成注释《广雅》的宏大工程。阮元《擘经室续集》卷二《王石臞先生墓志铭》评论道：“先生初从东原戴氏受声音文字训诂，遂通《尔雅》《说文》，皆有撰述矣。继而余姚邵学士晋涵为《尔雅疏》，金坛段进士玉裁为《说文注》，先生遂不再为之。宗其经学，纳入《广雅》。撰《广雅疏证》二十三卷，凡汉以前《仓》《雅》古训，皆搜括而通证之。谓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之外，似乎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则一丝不乱。此乃借张揖之书以纳诸说，实多张揖所未及知者，而亦为惠氏定字、戴氏东原所未及。”嘉庆元年（1796）王念孙在自作《广雅疏证序》中讲道，十年来以注释《广雅》为日课，每日疏证三字，寒暑无间，至是粗成。《广雅疏证》每每通过一个字联系到若干字，错综旁通，不仅仅解释疑义，更重要的是“借张揖书，示人大路”，揭示训诂学的弘纲大例。例如，念孙在疏证《释诂》时，由“取”义，联系到“聚”义，谈到“聚”义，又联系到“众”义，说明了词汇由于义类相近相因而彼此互通的道理，揭示了词义引申运动的规律。此类发凡起例，不胜枚举。王念孙之所以能完成疏证《广雅》这一成就，得益于他“以声音贯穿训诂”的综合研究工作，具体表现在：(1)以韵部为纲，依据自己所考定的古韵21部，将古书训诂材料分成21表。(2)以声纽为纲，依据古声23母，将古书训诂材料，汇而释之。1922年，上虞罗振玉购得王氏《雅诂表》21册及《释大》2册，就分别为以韵部和声纽为纲编写，皆属撰写《广雅疏证》的素材。张舜徽（2005：66）极为称许其治学方法：“用声音贯穿文字，从而发现声义相通之故。这种方法，可说是接近于近代科学的方法了。”

王引之治学秉承父教，21岁时应试不中，遂“亟求《尔雅》《说文》《音学五书》，之后“乃知有所谓声音、文字、训诂者”，四年之后念孙语以古韵21部之分合、《说文》谐声之义例，《尔雅》《方言》及汉代经师训诂之本原。

以前人们习惯于对实字的训诂，而对虚字容易忽略，每每将虚字作实字解。王引之对虚词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例如，《经义述闻》卷五证明《毛诗·郑风·终风》“终风且暴”的“终”字与“既”为一语之转。《经义述闻》保存此类发现还很多。王引之又用此法，遍搜古籍虚字160字，撰成《经传释词》十卷，蔚为大观。

训诂学与校勘学关系密切。王念孙作《广雅疏证》，除了诠释训诂，还做了一番仔细的校勘工作，这可以看作是对训诂成果的实际应用，正如张舜徽（2005：69）所言：“清代诸儒，包括王氏父子在内，早已将古声韵学、训诂学上的研究成果、贯注到校书工作中去了。”总体上，王氏父子的校书工作，覆盖经典和诸子，虽然王氏父子校书存在过于笃信类书的现象而遭人诟病，但是其在校勘学上成就是不可否认的。

任大椿是王氏最紧密的学侣，他从考证训诂、名物和制度入手研究经学。他沿着戴震《七经小记》的方向发展，写成《弁服释例》《深衣释例》《释缙》等，为后来的名物、制度考释工作做了很好的示范。任氏在辑录小学佚书方面成绩斐然，其代表性著作有《字林考逸》《小学钩沉》等，虽然辑佚效果不甚理想，但在学界亦有开路之功。

### 3 汪中父子及其学侣江藩

汪中学术门庭轩敞，尤以诸子学和诗文创作见长。张舜徽（2005：90-94）总结汪中在经学、周秦诸子、古代制度名物、古书语法等方面的重要发明和发现，是由于他善于做融会贯通、疏明大例的工作。汪中在语言学方面颇有成就，如所著《述学内篇·明堂通释》论证经典中的“明堂”有六，分别是宗周、东都、路寝、方岳之下、太学、鲁太庙，说明了古代建筑或制度名同实异的通例，给考古者启发极大。《述学内篇·释三九上》说明古书中称“三”称“九”，多是虚数；还说“通其语言则不胶其文字矣”，这就直接指出语言与文字之别，达到了很高的语言学理论境界。《述学内篇·释三九中》说，古人的发言时，有“曲”有“形容”，已经具有极高的修辞学意识。

喜孙乃汪中之子，与其父一样遭受早孤命运，结果刻苦自立，在学术上亦卓有成就，他认为做学问，必须弄清楚本末先后，循序渐进，不可急躁冒进。他在《从政录》卷一《再示左生书》中极力强调声韵之学等传统语言文字学根柢，“《经义述闻》实事求是，不尚墨守，非读书数万卷不能览，亦非



读书数万卷不能注。……为王宗伯之学者，远之读先秦、两汉之书，近之考顾、江、段、戴、江之古韵十部、十三部、十七部、二十一部。所以，非数十年、数万卷不为功。”

江藩，是汪中最亲密的学侣，前揭《国朝汉学师承记》之书足以奠定其语言学大师的地位。

#### 4 焦循父子与黄承吉

焦循学问规模宏阔，号称“通儒”。焦氏以研究《易经》的成绩最为专精，这得益于“数学”、“训诂学”两方面的知识，所谓的六书、九数之学，完全运用到《易经》的研究中去了。《雕菰楼集》卷八有《周易用假借论》，运用六书假借之理，说明易辞假借之例。焦循晚年撰《孟子正义》，先写长编，再加整理。

焦循之子焦廷琥，学问亦佳。父子二人，自为师弟。廷琥英年早逝，但写作却不少，有关语言研究的有《冕服考》《春秋三传经文辨异》等。

黄承吉是焦循最亲密的学侣。二人在做学问的方式和方法上彼此感染，有共同点。刘师培《左盒外集》卷九《近儒学术统系论》说：“黄承吉友焦循，移焦氏说《易》之词以治小学。故以声为纲之说，漶以大昌。”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二有《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在宋人“右文”说的基础上，作了一番汉语词源的理论探讨<sup>(2)</sup>。刘师培《左盒外集》卷二十《扬州前哲画像记》对黄承吉推崇备至，认为“黄氏注《字诂义府》，而义原于声之说明”，师培后来推衍黄氏之说，写成《字义源于字音说》。

#### 5 阮元

阮元是亲历乾隆、嘉庆、道光朝的“三朝元老”，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嘉、道年间，客观形势需要对成果丰硕的汉学著述作出总结。阮元适应时代潮流，在广东主持编刻《皇清经解》，汇集清初至乾嘉时期70多位著名学者的重要著作188种，清朝学术全盛时期的研究成果都网罗在内；在江西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416卷，撰《校勘记》243卷，总结先儒和清代学者的校勘成果；在浙江组织人力主编《经籍纂诂》106卷，搜罗唐以前的

(2) 沈兼士有文《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1986），详细介绍“右文”说的历史沿革。



训释资料。这三部大书成为乾嘉汉学总结性的标志。

阮元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此言不虚。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通论·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从阮元之言为定论》盛赞阮元对于古代建筑、制度的考证，指出“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明堂、辟雍、封禅是也。……今得阮氏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阮元留心金石，把铜器上的铭文，看成是可与《九经》并重，其金石研究，是作为考证经史的依据，解决学术悬案的。阮元《擘经室三集》卷三《商周铜器说·上》：“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铭之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阮元一生在金石考古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擘经室三集》卷三《金石十事记》记载了包括刊勒《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集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以及其他一些仿铸、摹刻金石文物等十件大事。

## 6 刘文淇及其子孙

刘文淇乃江都凌曙（亦属扬州学派重要人物）的外甥。文淇一生以研究《春秋左氏传》为专门之学，其代表性著作有《左传旧注疏证》（未刊行，仅纂成《长编》）《左传旧疏考证》。《春秋左氏传》也是仪征刘氏一家的专门之学。

文淇之子毓崧、毓崧长子寿曾皆精于训诂，勤于校勘。仪征刘氏三世校书，总结出了“分次校书之法”（见刘寿曾《傅雅堂文集》卷一《北堂书钞斟讎商例答蒯礼卿》）。毓崧在语言学方面的著作有《周易旧疏考证》《尚书旧疏考证》等。

## 7 刘师培

刘师培是刘毓崧的第三孙，也是扬州学派的殿军。刘师培《左盦外集》卷六《正名隅论》说：“训诂者，研究字义之学也；文字者，研究字形之学也；声韵者，研究字音之学也。必三者具备，然后可以言小学。”《左盦外集》卷六《正名隅论》《小学发微补》等提出就字音推求字义，取古语以通今言，亦用今言以通古语，其关键在于声音。这是继承明末黄生《字诂》《义府》的遗说，综合扬州先辈学者如黄承吉、焦循、阮元、王念孙、引之父子的研

究方法而提出的。刘氏根据这一方法，作过三十多条札记，都被章太炎吸收到《新方言》中了。1903年，刘师培写《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认为“欲社会学之昌明，必以中土之文为左验”，通过语言文字考察古代社会情状，已经有了社会语言学的意识。

刘师培还从应用的角度，提出语言文字规范的三项主张：(1)提出整理汉字和改革汉字的建议。(2)主张白话文，认为白话文是启迪民智、普及教育的有利工具，他在《论文杂记》中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3)主张改用拼音字，统一国语，其《读书随笔》中《音韵反切近于字母》一条曰“居今日之中国，舍形字而用音字，势也。废各地之方言，用统一之官话，亦势之所必趋也”。由以上诸条可见“刘氏年少气盛时识见之颖锐”。

## IV 扬州学派语言学研究的学术渊源和学术特色

### 1 学术渊源

扬州学派的学术渊源主要体现在师承授受、同好交游以及家学渊源三个方面。

扬州学派秉承乾嘉汉学，荟萃吴、皖两派之精华，特别是受皖派戴震的影响为最。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焦循、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师法戴氏。戴震“训诂之学传之高邮王引之，典章之学传之兴化任大椿，而义理之学则江都焦循能扩之”（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因此，“戴氏弟子，除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特别是焦循公开以私淑戴震自任，其《申戴篇》集中体现对戴震学术思想的理解。阮元学术受到焦循的影响，与戴学一脉相承，其纂辑古训成《经籍纂诂》，最初是戴震提出的，阮元实衍皖派学术之遗绪。由于扬州学派与戴震关系密切，皖派与扬派既有渊源关系，所以有人认为，同一个学者，在学派上可以两属。如王念孙是戴震的弟子，既属皖派，又属于扬派。

扬州学派同乡学侣之间互相砥砺，因而学术精进。例如，江藩是乾嘉吴派学者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与扬州地区的学者汪中、焦循、李惇、刘台拱等都有深交，与阮元是同里同学，阮元任两广总督时，江藩入其幕协助校刊《皇

清经解》，江藩《汉学师承记》即由阮元在广州为之刊刻并作序。再如，刘台拱与同时的王念孙、朱筠、程晋芳、戴震、邵晋涵等著名学者同游；汪中、阮元、焦循等扬州学人，也对王氏父子的学问十分推崇；嘉庆四年（1799）王引之为阮元《经籍纂诂》作序；黄承吉与同里江藩、焦循、李钟泗友善，以经义相切磋，时有“江、焦、黄、李”之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扬州学者中此类交游佳话，不一而足。

家学渊源也是促成扬州学派根深叶茂的重要因素。家学是指家族世代相传之学，例如魏晋隋唐时期的颜氏家族既有血缘关系，更有相通的学术观点<sup>(3)</sup>。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指出，东汉以后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这种“家门化”的学术特征，在清代扬州学派内部也颇为明显，如宝应刘氏、仪征刘氏、高邮王氏、江都焦氏、兴化任氏等家学隆盛，源远流长<sup>(4)</sup>。例如，自明初从苏州迁居宝应，迄明末宝应刘氏中的“淮南夫子”刘永澄和“淮海先生”刘永沁皆成为富有名望的理学大家，宝应刘氏一跃而成江淮望族，至清代更是培育出刘台拱、刘宝楠等学术名流。李详《药裹慵谈》卷三《论扬州学派》云：“吾扬自卢雅雨先生为运使，延惠定宇修定《感旧集》及《山左诗钞》。华亭沈学子、青浦王述庵与惠同馆卢署，休宁戴东原往来其间，扬州是时已开小学校雠一派。而吾乡顾文子、任子田相继而起，高邮则贾田祖、王石矐、李孝臣，宝应有刘端临，江都则汪容甫，仪征为江秋史，并研精汉学，各树一帜。再次则焦里堂、阮文达、王文简、黄氏承吉、钟氏怀、李氏钟泗、徐氏复及寓居扬州之凌氏廷堪、江氏藩，是皆继贾、王而起者。其后又有凌氏曙、汪氏喜孙、薛氏传均、梅氏植之、刘氏宝楠、成氏蓉镜，与凌氏之甥刘氏文淇。文淇传子毓崧，毓崧传子寿曾、贵曾兄弟，贵曾传其从子师苍及子师培，是为刘氏四叶之学。刘氏之门有田氏溥光、薛氏寿、陈氏立，又有刘氏恭冕、梅氏毓，皆传其家学，羽翼刘氏，不背师法。”从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再到刘师培，仪征刘氏四世治经，名震大江南北。论清学者，经常把苏州惠氏和仪征刘氏之家学相提并论，足证其学术地位之显赫。再如，高邮王念孙父子为清代文献学巨擘，而实际上，

(3) 有关颜氏家族语言文字学的传承发展情况，可参见徐秀兵（2015）。

(4) 在扬州学派中，部分学者自幼贫苦，几无家学可承，如汪中、凌曙、凌廷堪、李钟泗、徐复、梅毓、刘文淇等，皆“不假师资，自力学以成名”，其向学发愤之精神尤可嘉许。

高邮王氏之学传至王引之,已然经历了六代。高邮王氏取得如此的学术成绩,其家学渊源亦不能忽略。

为了使扬州学派的学术渊源关系更加直观化,我们可参看图1《扬州学派学术渊源示例》(引自卞孝萱(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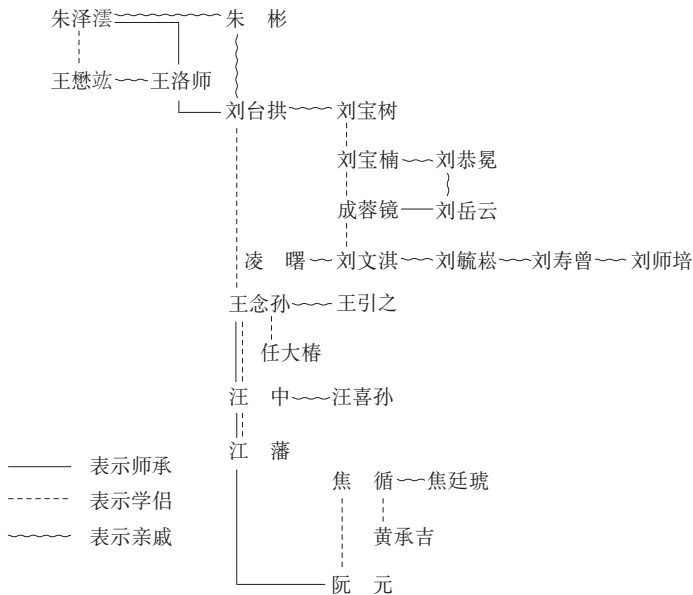


图1 扬州学派学术渊源示例

## 2 学术特色

扬州学派语言学研究上体现出的特点为:重视经籍及小学根柢之书,分工协作以补足学术短板,治学目的注重经世致用,学术研究“能创能通”“圆通广大”。

如前所述,小学是中国语言学的前身,而小学最初附庸于经学。扬州学派学者皓首穷经,重视儒家经典(如传统的十三经等,但不限于此);语言文字乃通经之工具,因此他们亦均重视《说文》学、《雅》学及音声之学,而上述特点自戴震已开其端。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记载了戴震强烈的学术思辨能力,以及三年读通许氏《说文解字》之后通解经典的故事:“君年十岁,乃能言。就傅读书,过目成诵。塾师授以《大学章句》右经一章,

问其师曰：‘此则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此子朱子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曰：‘然则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师不能答。读书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解之，意不释。师恶其烦，乃取许氏《说文解字》，令检阅之。学之三年，通其义；于是十三经尽通矣。”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扬州学派注重学术研究的分工协作，补足学术短板。乾嘉之学被后世叫做“段（玉裁）王（念孙）之学”，段氏虽不属于扬州学派，而段王之间却是亲密的学侣关系，他们常互通学术信息。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念孙入京，常诣朱筠，与谈六书精义，后以高价购得毛刻北宋本《说文解字》，自谓归而发明字学，将著书四种，以配顾氏《音学五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王念孙为朱筠校订汲古阁《说文》刻之，乾隆四十一年（1776），王念孙正注释《说文》。后来，王念孙得知段玉裁已经致力于注释《说文》，遂转攻其他学术方向，集中精力作《广雅疏证》。等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成书，念孙欣然为之作序；王念孙《广雅疏证》成书，段玉裁亦为之序。可见，段王都重视《说文》在文献语言学研究中的根底地位，都有为之作注之计划和实践，学术眼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二人为避免重复劳动，皆选择最当用力之处，最终各自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再如，对于专经的疏证。道光八年（1828），刘文淇、刘宝楠赴金陵应省试，不第，遂相约各治一经，刘文淇治《左传》，刘宝楠治《论语》。

通经致用是扬派学者共同的治学倾向。朴学祖师顾炎武提出由音韵文字通诸子百家的主张，借以达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的经世致用的目的。顾氏一生以经世济民自任，曾说“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其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治学主张为扬州学派所崇尚。从总体上看，乾嘉时期经史考证形成潮流，与吴、皖两派相比，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在扬派学者中得到了明显的重视和加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就成为他们和吴、皖两派相区别的一大学术特征。汪中曾说“中少时问学，实私淑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表明了自己的学术渊源和治学宗旨。阮元曾极力称赞顾氏，并说“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以汪、阮为代表的扬派学者看到了汉学脱离实际的弊端，他们远承顾炎武通经致用的学术宗旨，主动向经世实学回归。

焦循亦推重用世之学，他说：“循谓古人之学，期于实用。”扬派后期学者汪喜孙也强调：“通经与力行，更不必别。道与艺合，道与器俱。”扬派殿军人物刘师培从应用的角度，提出语言文字规范的多项主张。

语言扬州学派语言学研究还具有“能创能通”“圆通广大”的特点。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标举“汉学”旗帜，门户之见颇深。皖派虽然强调实事求是，仍带有门户之见。皖派领袖戴震排斥宋学尤严，他对宋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受顾炎武治学汉、宋兼采的思想影响，以阮元、焦循为代表的扬派虽不主张宋儒的治学方法，但并不排斥宋学本身，他们力主不立门户，兼容并包。张舜徽（2005：7）推崇扬州学派，认为“扬州学者治学的特点，首先在于能‘创’，像焦循的研究《周易》，黄承吉的研究文字，都是前无古人，自创新例。其次在于能‘通’，像王念孙的研究训诂，阮元的研究名物制度，汪中的辨明学术渊流，都是融会贯通，确能说明问题，这都是吴、皖两派学者们所没有，而是扬州诸儒所独具的精神和风格。”因此张舜徽用“能见其大，能观其通”八个字概括扬州学派的优良学风，认为扬州学派的治学精神和取得的成就，都有圆通广大的气象。通过前文对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语言学研究实绩的梳理，不难看出，扬州学派语言学研究亦体现出“能创能通”“圆通广大”的特点。

## V 扬州学派语言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扬州学派是从乾嘉汉学思潮过渡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体现出近代学术的特征。特别是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人，已生活于鸦片战争前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近代科学的影响，学术研究更具近代气息。扬州学派的语言学研究对后代影响深远，试举例如下：

高邮王氏父子在语言学研究中，已具有近代词汇观念和语法观念。王念孙父子的“连语”用语体现了强烈的语素意识，对当代汉语复合词构词研究，颇有启发意义。（李运富，1990、1991）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其《文言虚字》序言中说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是王引之《经传释词》虚词研究的继续。王力认为，高邮王氏父子等人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

阮元主张由声音以贯通训诂，曾在《揅经室一集》卷五《与郝兰皋论尔雅书》中说：“言由音联，音在字前。联音以为言，造字以赴音，音简而字繁，

得其简者以通之，此声韵文字训诂之要也。以简通繁，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郝懿行是阮元门生，后来根据阮元指示作《尔雅义疏》，只可惜郝氏不甚精通音韵之理，故《尔雅义疏》未臻完善。古代训诂材料的主要形式是训释（王宁1996: 59），历代积累下来的注疏构成中国语言学的重要宝库，因此阮元主持编刻的《经籍纂诂》价值巨大，这为后来朱骏声撰写《说文通训定声》提供了素材，当代《故训汇纂》也是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成。

再如，汪中的学术对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撰成颇有启发意义。汪中《述学内篇·释三九中》谓“古之名物制度不与今同也，古之语不与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尽知也。若其辞则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并举例说明。其中的“曲”和“形容”就是陈望道《发凡》中的“婉曲”与“夸张”辞格，陈望道（1954: 135）盛赞汪中：“古来论铺张修辞最周到的，据我所知，要算汪中为第一”，其引例亦取自汪中。

另外，扬州学派在疏证经典时先成《长编》的步骤和方法对清代后期的学术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俞樾《续论语骈枝》、章太炎《广论语骈枝》效仿刘台拱《论语骈枝》而作等等，从中都能窥见扬州学派对后人产生的影响。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语言学研究既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既要为保护古代文化精华服务，又要适应当代语言生活的发展。当代语言学大家、章黄学派的重要传承人王宁先生曾多次呼吁，要重视挖掘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论著里的潜理论，实现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本文简要梳理了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学术渊源、学术特色以及学术影响，展示了这一学术共同体语言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希望能引起更多同仁的关注并深度发掘其中的语言学思想。

#### 参考文献：

- 卞孝萱（2005）张舜徽先生与《清代扬州学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陈望道（1954）《修辞学发凡》，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 陈祖武（2012）《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段玉裁（1988）《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郭明道 (2003) 论扬州学派的学术特征,《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 期。
- 何九盈 (2013)《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江 藩 (1983)《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
- 李运富 (1990) 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解实践(上),《古汉语研究》第 4 期。
- 李运富 (1991) 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解实践(下),《古汉语研究》第 2 期。
- 梁启超 (2008)《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刘师培 (1997)《刘申叔遗书》,南京:凤凰出版社。
- 皮锡瑞 (1954)《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
- 启 功 (2010) 清代时政与扬州文化,《启功全集》第八卷《启功讲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 沈兼士 (1986)《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 王 力 (2013)《中国语言学史》,北京:中华书局。
- 王 宁 (1996)《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王念孙 (2004)《广雅疏证(附索引)》,北京:中华书局。
- 王引之 (1991)《经传释词》,长沙:岳麓书社。
- 徐 复 (2000)《馗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徐秀兵 (2015) 颜氏家族的语言文字观及其影响,《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 146 号。
- 殷孟伦 (1980) 王念孙父子《广雅疏证》在汉语研究史上的地位,《东岳论丛》第 2 期。
- 郑晓霞·吴 平 (2008)《扬州学派年谱合刊》,扬州:广陵书社。
- 张舜徽 (2005)《清代扬州学记 顾亭林学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附记: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 16YJ080208。